

# 官渡之战是曹操执行法家军事路线的胜利

工农兵儒法斗争史学习班

公元二〇〇年，曹操同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展开了一场决定存亡的决战。曹操“以至弱当至强”，一举歼灭了袁绍屯营东西十余里的十数万大军，“威震天下”。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给了这个中原最大的分裂割据势力以致命的打击，为后来统一北方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官渡之战的曹胜袁败不是偶然的，是曹袁双方推行儒法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的必然结果，是曹操执行法家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东汉末年，专擅朝政的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豪族地主大肆兼并土地，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公元一八九年，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这次农民起义虽然被地主阶级镇压下去了，但是它沉重的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客观上为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改革政治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的官吏和豪族地主，拥兵自重，各霸一方，趁镇压黄巾起义之机，或相互勾结，为非作歹；或彼此倾轧诛杀，拼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形成军阀混战不休，天下大乱的局面。这种战乱使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阡陌荒芜”，“荆棘丛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原来是繁华的京师洛阳地区，被摧残成一片惨淡景象。面对这种局面，号称“儒学大族”的军阀袁绍、袁术和孔老二的二十二代孙孔融等反动儒生，拼命鼓吹“尊儒贵学”，提出要按“周礼”分封诸侯，顽固地推行复古倒退路线。袁绍“座作声价，好养死士”（《后汉书·袁绍传》），为其进行分裂割据招兵买马。他凭借“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那些“好言饰外”的儒生接踵而至，“门生故吏遍天下”。他自恃地广兵强，到处发动割据战争，但是对乌桓、鲜卑等外族的侵扰，却奴颜媚骨，屈辱求和。豪族势力相争割据，不但人民惨遭屠杀蹂躏，而且割据势力的战争和土地兼并也侵犯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之希望结束战乱，实现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恢复和发展生产，就成为劳动人民和中小地主阶级的强烈愿望。法家代表人物曹操顺应了这一潮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要求，作为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并以坚持统一，打击豪强割据势力，“为天下除暴乱”的目的，同袁绍为代表的复辟、倒退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官渡之战就是在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形成的。战争的结果，是进步战胜倒退，统一战胜分裂。

儒法两家政治路线不同，治军的原则自然亦不相同。袁绍遵循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把“非礼威严不行”（《礼记·曲礼上》）奉为至宝，大搞“繁礼多仪”；为了大树特树个人威严，“爱士养名”，“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以宽济宽”，使得政令不一，军纪松弛，将骄兵悍，指挥不灵。袁绍的大将沮授在官渡之战前就感觉到了袁军“主骄将怙”，难保不“骄者先灭”。同儒家之徒袁绍相反，曹操推行“以法治军”的原则，明确指出：“礼不可以治兵”，“法度不可失”；申明“吾在军中，持法是也”！选用“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并以“设而不犯，犯而必诛”（《孙子十家注·计》），“所

不是正之以法”来“使上下知制”。他早在做洛阳北部尉时，就“不避豪强”，“持法峻刻”，悬五色棒于衙门，“有犯者，不论权势，一律打死”（《曹瞒传》）。有一次，汉灵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叔仗势违法，曹操把他捕获归案，正之以法。在他任济南相的时候，把阿附贵戚，贪赃枉法的十多个县的长吏“奏免其八”，于是“奸宄遁逃，窜入他郡”（王沈：《魏书》）。曹操不仅“法不阿贵”，而且执法不徇私情。曹洪是曹操宗室，他的宾客犯了法，满宠依法惩处，曹操大为称赞。曹操不准部队劫夺财物，在《步战令》中规定：“士卒战，皆不得取牛马、衣物，犯令者斩。”两种治军的原则，必然是两种不同的结果。官渡之战中袁曹双方力量寡悬殊，袁绍拥有“精兵十万，骑万匹”，铠甲万余件；而曹操步兵、骑兵共才三万余人，铠甲只有二十余件。但是，在官渡之战的各个战斗中，曹军“士卒皆殊死战”，最后终于以少于袁绍几倍的兵力，打败袁军，大获全胜。可见袁绍以“礼”治出的军队是缺乏战斗力，不能同曹操以“法”治出的军队相匹敌的。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袁绍只知道到处发动战争，掠夺地盘，根本不发展生产。在他统治的地方“豪强擅姿，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曹操：《收田租令》）。他连年攻打公孙瓒，“并四州之地”，一路上烧杀抢掠，弄得民不聊生，部队没有粮，只好“仰食桑椹”。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出兵黎阳，进攻许昌。当时大将沮授说：“近讨公孙，师出历年，百姓疲敝”，应该“务农逸人”，建议不要出兵。但是袁绍“不许而意恨之，复省其所部”（《后汉书·袁绍传》），削减了沮授的兵权。与此相反，曹操“肇申、商之法术”（《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推行法家耕战政策。曹操总结了秦皇汉武的耕战经验，认为“失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置屯田令》）。他在注《孙子兵法》中说：军无辎重，无粮食，无委积，“无此三者，亡道也”。因此，曹操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支持战争的物质基础。他占据的兖州、豫州地域狭小，而且受到战争的摧残十分严重。他就在许昌等地大量招募流民，置田官实行大规模的屯田。这种寓兵于农，耕战合一，兵民合一的政策，既使破产流离的农民有所依归，生活得到安定，又解决了后备兵源和军粮来源问题。在官渡之战双方已进入战前的紧张阶段，曹操还不忘屯田，命令卫觳率兵至关中招收流民屯田，以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曹操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很重视提倡节俭。他自己“不好华丽”，“以俭率下”，“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女儿出嫁时“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他在遗嘱中告诉部下和家属：“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他的妻子卞氏受他的影响，在曹丕称帝被尊为太后之后，还保持节俭的风尚。她说：“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过日久，不能自变为奢”（《三国志·魏志·后妃传·武帝卞皇后注》）。然而曹操奖赏耕战有功之人却“不吝千金”，并且“赏善不逾日”。曹军能够在官渡之战中以寡敌众，同袁军对峙五十日之久，最后终于得胜，这是与曹操奖励耕战，实行屯田，倡导节俭等一系列措施分不开的。

三条路线是贯彻政治路线的保证。在用人路线上，袁绍大搞儒家的“任人唯亲”。他为了维护自己的世袭爵位，大搞“分封制”。他偏爱小儿子袁尚，“欲使传嗣”，就把大儿子袁谭封为青州刺史，把二儿子袁熙封为幽州刺史，把外甥高干封为并州刺史……，总之，“任人唯亲或子弟”。对有些不属亲戚但被任用的人，他“用人而疑之”，弄得他的部下“谗言噂沓，互相倾轧”。虽然他手下也确实有一些有本事的人，但由于他“外宽内忌”而都未能

发挥其才干。如官渡之战前夕，曹操为了取得战略上的主动，避免两面受敌，趁袁绍大军尚未压境之际，不失时机地亲自率兵去征伐当时与袁绍相呼应的刘备。袁绍的谋士田丰劝他趁此机会袭击许昌，但袁绍却以自己的小儿子有病为借口拒绝了田丰的建议。可是在曹操打败了刘备以后，袁绍却要出兵进攻曹操。田丰又以“既失前机，不宜便行”劝阻袁绍等待机会，以图后举。袁绍这次不但不听，反而以沮丧军心的罪名，把田丰囚于监牢。后来，袁绍从官渡惨败逃回，有人对田丰说：“君（指田丰）必见重”，田丰说：“公（袁绍）貌宽而内忌，……若胜而喜，必能赦我，战败而怨，内忌将发。若军有利，当蒙全耳，今既败矣，吾不望生”。袁绍果然以“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把田丰杀了（《后汉书·袁绍传》）。由于袁绍推行这条错误的用人路线，结果是内部分裂，众叛亲离。在官渡之战中，袁绍的部将张郃、高览，谋士许攸等人先后都投向了曹操。曹操则不同。他一反儒家的所谓“亲亲之道”，提出一条“唯才是举”的“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他认为：“将贤则国安”（《孙子十家注·作战》篇）。并说：“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他非常重视选用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对那些反动儒生，如孔融，祢衡等，“虽时有威名”，但“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使他们“终莫得进”（《三国志·魏志·毛玠传》）。不但如此，他还善于从基层发现和提拔人才，“不间远近”，“不拘微贱”，只要有本事，都量才录用，给予适当的职位，如“拔于禁、乐进于行陈（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三国志》注引《魏书》）。在和下级的关系上，曹操“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郭嘉赞扬说：“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三国志·魏志·郭嘉传》注引《傅子》）。如早年跟随曹操的谋士程昱性情刚直，脾气暴躁，与一些同事不睦，有人就在曹操面前进谗言，称程昱要谋反，但曹操对此则不以为然，并对程昱“赐待益厚”（《三国志·魏志·程昱传》）。在官渡之战结束以后，曹操缴获了袁绍不少书信，从中发现有的是他部下以前写给袁绍的，对此，曹操未加追究而“皆焚之”，并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曹操对于反对过他而又有才能的人，也能加以使用。如陈琳替袁绍作檄文，大骂曹操三代，绍败归操，“操爱其才而不咎，以为记室，军国书檄多出其手。”由于曹操认真推行法家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所以他手下文官武将人材很多，这是他能取得官渡之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袁绍是一个不读书，“不知兵要”的大军阀，大草包。在官渡之战的战略指挥和战术原则上，袁绍都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指导的，因而屡次贻误战机，指挥一再失策。他吞并公孙瓒以后，“众实疲敝”，本来应该整顿军队，待机南下，他却骄心太盛，妄图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一口吞掉曹操，坚持进兵黎阳；当曹操带兵去攻打刘备时，田丰向他提出乘机直取许昌的建议，他却“以己之喜怒”而拒不采纳，从而坐失时机；在官渡之战中，大将沮授劝告袁绍，“我军利于持久，曹军利于速决”，建议不要急于决战，他却置若罔闻，忙于交锋；当谋臣许攸和大将张郃发现曹军后方空虚，建议袁绍派兵迂回敌后，攻占许昌时，他却坚持一线平推，硬攻官渡；他把粮草屯积在大营以北四十里的鸟巢，却仅派部将淳于琼带少数人马防守，当沮授向他建议

派重兵驻扎粮库两侧以防袭击时，他又毫不在意，麻痹轻敌；当鸟巢被袭时，袁绍不是全力以赴先救鸟巢，而主观地认为曹营必然空虚，命令张郃、高览全力攻打官渡……由于以上种种的错误，结果鸟巢失守，十万主力被歼，袁绍本人仅带了八百残兵窜回了河北巢穴。

曹操是一个军事家，他熟读《孙子兵法》，重视实践，“作兵书十万余言”，“深知兵要”，同袁绍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他认为，在战争中，“战在我，非在敌”，“兵无常势”，强和弱都不是绝对的，只要注意全面分析敌我双方的矛盾，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临敌制变”，就可以使力量的对比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最终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所以，在官渡之战爆发前夕，处于劣势的曹操面临袁绍十万大军而毫不畏惧，并且充满必胜信念地说：“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多兵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以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指导战争，采用“避敌所长”，“击其懈怠”，“以利动敌”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胜利。当曹操得到袁绍率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的消息以后，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他先后命令曹仁、臧霸等攻占了战略要地射犬、青州、北海、鄆城、延津等地，以阻挡和牵制敌人。然后“象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一样，主动放弃了一些对战略毫无意义的地方，集中兵力，选择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官渡扎营设防。同时，他又抓住袁绍和刘备的兵力尚未集中的机会，以速决战击溃刘备，为官渡之战扫除了军事上的障碍。在官渡之战的第一仗白马战斗中，曹操为了解白马之围，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派兵先赶至延津，摆出北渡黄河，佯攻袁军后方的样子，迫使袁绍把部分主力向延津调动。曹操却“趁其不备，出其不意”地亲率轻骑急奔白马，使袁军仓促应战，大败袁军，斩袁绍大将颜良。白马解围后，他又引军撤至白马山，“先据利地”，故意解鞍放马，“遂以辎重饵贼”。使袁军追至，争抢辎重，队形猝乱，曹军突然杀出，以不满六百骑兵，大败六千袁军，斩袁绍大将文丑。后来，当袁绍的谋臣许攸投奔曹操，向他建议抄袭鸟巢时，曹操认为“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便留下曹洪、荀攸守官渡大营，自己率步骑五千，冒充袁军，夜袭鸟巢，并乘袁军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机，殊死猛攻，斩守将淳于琼，把袁军粮草焚烧殆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曹操夜袭鸟巢后，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袁军军心大乱，内部分化，不失时机的立即发起反攻，一举获得官渡之战的全胜。

官渡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也是儒法两家两条政治、军事路线斗争的结果。研究官渡之战，对于我们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是有帮助的。在官渡之战的过程中，袁绍多次迟疑不决，贻误战机；林彪则声称他的“四快一慢”，重点在于一个“慢”字，这和袁绍的打法是相同的。袁绍只知一线平推，打的是得不偿失的“阵地战”，“消耗战”；林彪则反对打游击战，运动战，这和袁绍的打法也是一致的。袁绍大搞主观唯心主义，凭“想当然”指挥战争；林彪则靠他那个“特别灵”的脑袋，臆造出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强迫别人死记硬套，这和袁绍的指导思想又是同出一辙的。……不难看出：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与儒家的反动军事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研究和总结儒法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经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本文作者：新都机械厂孟玉成、成都市冶金局袁彦南）